



源於奧運

李漢源

從足球看社會

日前政府宣布將放寬防疫政策，意味着本地體育賽事也將可以一如期舉行，再不需要邊舉辦、邊提心吊膽地想着因疫情而要改期的後備方案，有雨過天晴之感。今個星期筆者參與一個台山社團總會主辦的學界排球賽事，見到一大班中學生，興高采烈一早來到球場比賽，個個摩拳擦掌希望馬上落場一展身手，想必他們已因疫情被困多時，能夠重新出來活動，可以過以往正常學生生活，其興奮程度真的難以想像。

其實這幾年疫情對青少年的成長實在有不好的影響，因為我總覺得體育、運動、比賽等對青少年成長有正面幫助，尤其是隊際比賽，可訓練他們合群、互相幫助、相互扶持，大家一齊去打比賽，可以學到絕不只球技，而是一系列對人生有幫助的元素。參賽中有一隊的隊員均是不同國籍的，比賽中他們用多種語言交流互相提點，奮鬥心亦很強，雖然他們排球水平並不是最高，但也能憑着隊內團結打贏一場又一場，希望他們能帶着這股氣勢殺入決賽。香港電視觀眾可以於今個星期日，10月9日下午兩點半香港電台32欣賞這一班香港排球明日之星的直播學界賽事。

體育是需要傳承的，而要社會體育風氣熱烈，就要一代接一代的傳承下去，雖不一定要每人都參加比賽，但如建立了運動潮流就一定可以令社會風氣注重強身健體。例如當年香港

滑浪風帆奪得奧運金牌，參與風帆訓練的年輕人馬上多了很多；今屆奧運劍擊勇奪金牌，參與玩劍擊的同學也馬上多了很多，雖有人認為一窩蜂未必可以維持很久，但能令未來棟樑們對運動的興趣萌芽，又怎會不是好事呢？我們是前人，可以製造體育風氣，待青少年參與體育，引領他們走上一條正確健康之路。

有時前人做得不錯有成就，要傳承給下一代，卻未能達到預期效果，所謂「創業難，守業更難」，足球就是面對這問題，雖然參與足球活動的人很多，足球是一種好玩又好睇又好睇運動，以前能製造熱潮，但現在失去了風氣，每次路過小型足球場，總是見到年長人士在踢波，不像以前總是一大群青少年的地盤，足球應該不是長者玩意吧？筆者因工作關係曾在巴西、日本等街頭拍攝當地的足球生活，在球場總會拍到一群青少年踢波，相較之下香港青年足球人口真的很少，相反長者足球人口就較多，星期六、日在旺角麥花臣小型球場或灣仔修頓小型球場經常有比賽，分40、50、60、70歲組，有過半是過往踢甲組或香港隊球員球星，所以都吸引過千觀眾觀看，觀賞性十足。

「傳承」是由下一代自由發揮還是應該由上一代設好系統有計劃傳承下去呢？其實社會上有很多事情也靠着制度傳承，足球是一個反映社會的小環節，如每一個小環節都能處理得好，這個大環節就能成為美好社會。

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不要讓名字成為絆腳石

華裔、亞裔或非裔等少數族裔，名字因為與英文26個字母發音相去太遠，在英語國家裏，尋找工作時總會遇到多少麻煩，尤其是名字冗長拗口的非裔。

華裔比較好一點，我們飄洋過海謀生的祖宗，為求僱主和自己方便，數不盡自動轉名的彼得/查理/威廉/大衛，順口易記，一百幾十年來，還算工作順利，除了個別種族歧視，還不至於有太大的問題，辦公室政治的歧視則是題外話。

名字過長拗口，在華文來說，用字過僻，相信求職或進行工作也可能有一定難度，就是受到障礙，當事人還不知道，比如資方從眾多求職者名單挑選用人時，負責查閱者叫不出也寫不出的名字，故意溜過也是常有的事；甚至僱主為了不想日後溝通麻煩，同一學歷、同一條件兩個應徵者，說不定也會剔去名字拗口那一個，名字簡單順口，先天富音樂性，至少已予人親切感；名字乾澀拗口，就是出入境也會經常帶來不便吧，人際間交往，也可能像放置在自己大門前的無形頑石，有點拒人於千里。

取名選用僻字不是為貪一時好玩，也無非旨在強調性格與人不同，今日很多香港新一代事業型女性，為了表示自食其力，不再像她們母親那一代經濟需要依附異性生活，名字多已撇除用到什麼女性美的珍蘭芬芳，更視什麼真賢淑德為封建囚籠，甚至也不屑於在乎什麼勝男超男做男，主要為了表示「我係我」，只在字典裏挑不見有人用過的僻字，這現象比起來，內地新一代流行的瓜瓜毛毛倒灑脫多了。

娛樂圈中很多新進以僻字用名的女藝員，有些字連字典也查不出來，大概以為名字愈僻愈易引人注意，殊不知名字愈淺白愈易宣傳之效，試看看同是詩人，李太白/白居易詩好之餘不是更容易引人傳頌嗎，蔡母濟/權德輿就算也有「二白」一樣詩才，至今還有幾多人認識？



◆重名好還是清秀好？ 作者供圖

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參與感與鼓勵性

欣聞國家第四批預備太空人的選拔工作，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「載荷專家」，消息令人興奮。雖然全國名額只有兩位，且有學歷和年齡要求，入選機會不多，卻具象徵意義。那不僅僅是學術資格的認可，重要的是傳遞出港人有機會參與國家級科研大事的信息。

國家發展一日千里，航天科技近年屢傳捷報，看一艘艘「神舟飛船」順利返回地面，港人也與有榮焉；國家太空人訪港，更廣受市民歡迎，但那主要還是「觀者」身份。如今，港人有機會參與其中，代表中央對港人的關心和信任，無疑為人心回歸打了支強心針。

在太空領域，港人以往較多接觸的是美俄主導的「國際太空站」及其相關信息，主要受由此啟發而創作的電影和時裝設計等流行文化影響，尤其是科技巨頭大炒「太空旅遊」概念。記得幾年前跟科技記者談選題時，發現他經常撰寫國際太空站相關文章，我建議他把眼光擴大，留意中國近年的航天科技發展。他說，人家提供的資訊多，更有不少衍生產品資料，感覺親近。

機構合作運轉，我國曾表達參與其中的意向，卻遭美國反對。不過，此舉反而促使我們自力更生，建立自己的「天宮太空站」。不過，對一般港人來說，中國人和太空還是有一段距離的。

這令我想到今年開始落地港澳的「國家藝術基金」，本港共有9個項目入選。我曾接觸過幾位獲獎者或獲獎項目負責人，比如「書法《矛與盾》」獲獎者容浩然、「小戲曲《畫皮》」獲獎項目之靈霄劇團創辦人高鴻潤等，他們都說多年努力獲國家級認可，深受鼓舞，更有參與感。尤其是個人化或小劇團式創作，一直都是矢志堅持和艱難維持。

科技創新和文藝創作往往不是短期見效的，參與其中的人若不是特別專注和熱愛，是很難堅持下去的；而且在研究或創作過程中，還要不斷地調整和更新，冒着前功盡棄的失敗風險。

過去，由於「兩制」因素，加上「有心人」教唆，部分香港年輕人對祖國疏遠，慢慢生離心，以致發生諸如3年多前的「黑暴」，更有懵懂中學生提出「為什麼要跟中國融合而不是其他國家」之類的疑問。這其實跟參與感有關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往往是在參與其中而增加了解，產生親切感，對國家的認同亦然。



法官

方芳

法官的天與地

香港人對國家的司法認識不深，因為香港實施的「普通法」與內地的「成文法」有不同，只是透過內地一些大案的宣判，略有所知；最近看了內地熱播劇《底線》，對當代中國司法，有進一步的認識。

這部由劉國彤執導，靳東、成毅等主演的電視劇，真實案件演繹，反映司法人員堅守人性、道德、司法底線，又有相當篇幅普及法律知識，讓人民在生活中了解法律常識，用法律武器，保護自己的權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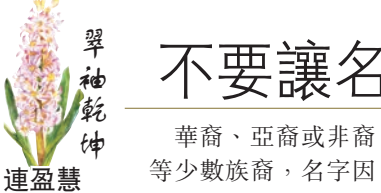
如《追債尋母案》、《被男友閹割殺害案》、《高校生弒母案》等，透過人倫的考量，讓法律變得更有溫度。

該劇被認為真實、感性，主要是劇情貼地，不是高官貪污案，而是老百姓在新時代面對的新糾紛，好像《主播猝死案》，網紅在勞累中猝死，如何向網購平台索償；《奶茶加盟案》反映了不少連鎖加盟店合同存在的問題，對創業者不無啟發。

此劇之所以令觀眾追捧，拍攝手法是相當成功的，一定的篇幅描寫法官一槌定案的背面，也有生活的喜怒哀樂，法官在判案後被取訴一方騷擾，法官在案件調解後又有逆轉發展，法官找不到說理的地方，會委屈得暗自抽泣；法官也有自己解決不了的家庭問題，如單親子女照顧母親，家長面對子女學校霸凌問題，更有經濟誘惑……，中國內地司法人員的天與地，並非一片冰冷的凍土，也有老百姓的火與熱。

該劇以一個地區的法院為基地，堆積如山的案件糾紛，法官能調解就調解，我們也從中看到調解手法的高低。一宗房產案，華僑富商的姨太太，住在已故富商的老房子，等到百齡不見人歸來，卻是等到富商的兒女收回房子，法官在法外情，爭取讓老人家過百齡生日後才搬遷，是很溫暖人性的一幕。

據說該劇拍攝前期，採訪過百餘名法院工作人員，全部改編自真實案件，演員體驗法官生活，所以演員演來真實自然，值得香港觀眾一看，從中了解當代中國的國情。



百家廊

孫貴頌

草地8月雪

從西安走時，氣溫攝氏38度。這是1985年的夏天。我和妻利用假期外出旅遊。

我們沿寶成鐵路南下。茫茫夜色中，只感覺火車不時地穿過一個隧道，又穿過一個隧道；視線一會兒兒青、一會兒幽暗、一會兒又轉成鉛灰。這條鐵路，是中國鐵路史上的奇跡。沿途幾乎全是崇山峻嶺，地勢極為複雜，工程艱巨異常。共和國的鐵道兵和鐵路工人，硬是逢山開道，遇壑架橋，在長達1,083公里的鐵路線上，打通隧道427個，架設橋樑653座，在隧道裏或橋樑上建造了幾十個「地下車站」或「空中車站」，整個工程歷經12個春秋，1970年7月1日正式通車。於今我們身臨其境，卻因為是晚上，體會不到多大驚險，留下些許遺憾。

凌晨到達昭化車站，馬不停蹄地趕到汽車站，坐上了去往九寨溝的汽車。一路上的勞頓非言語所能道盡。那時交通落後，我們坐的竟是一輛解放牌卡車，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搖蕩，一邊是懸崖峭壁，另一邊是水流湍急的白龍江，人似在畫中游，心卻提到了嗓子眼。一天下來，嘗盡「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」的滋味。好在九寨溝的風景迷人，算是將一路上的艱辛做了補償。

從九寨溝出來，有人指點，可以坐九寨溝至成都的旅遊車，途經松潘草地，「走」長征路。這一消息，使我倆陡添驚喜。一咬牙，每人花80元買了一張車票——這在當時可是昂貴的，過草地。

時值8月。出發時還是豔陽高照，酷暑當頭。我們這一車來自天南海北的遊客，清一色夏裝裹身。我穿短褲背心，妻着短衫長裙。進入草地後，人煙逐漸稀少，頓有荒涼之感。偶爾可見一些石頭堆，討教同行客方知，那叫「瑪尼堆」，藏語稱「朵幫」，就是疊起來的石頭之意，類似於蒙古族的「敖包」。說明我們已進入藏族居住地區。藏民以碎石塊壘成堆，布上經幡，每次路

過時，就在石堆上添加一些石塊，然後繞「瑪尼堆」順時針走3圈，祈求上天保佑。這裏人煙稀少，天高地闊，間或出現幾頂帳篷，二三牧民，還有陪伴他們的牛馬。牧民見到汽車，老遠就招手，就喊叫，我們還之以禮，也揮手、也喊叫。雖然素不相識，心卻在溝通交流。天空忽有蒼鷹盤旋，妻首先喊：「高山之鷹！」車廂裏的人都伸出頭來，對着天空大叫：「高山之鷹！高山之鷹！」車廂裏，一派浪漫、歡樂景象。

不料，再往前走，氣氛逐漸冷卻下來。雖然門窗緊閉，但我們卻分明感覺到寒冷在逼近、壓迫過來。一步一步，一點一點，令人漸漸招架不住。冷，徹骨的冷。又過了一段時間，天空中居然飄起了雪花。雪花紛紛揚揚，似乎很溫柔，很耐心，輕輕地叩擊着門窗，無聲無息地陪伴着我們前行。同車中有幾個廣東青年，生平第一次見到真雪，不由激動得大呼小叫。當司機在一個地方停車讓大家「方便」時，他們又是拍照，又是打雪仗，可樂壞了。路旁有青青的小草，小草中間有成群的犛牛，以黑色居多，毛長長的，在悠閒地吃草。犛牛不怕冷。

我們怕冷。在車廂裏面坐着，又不能活動，大家一個個瑟縮着，紛紛從隨身的行囊中搜尋衣服禦寒——實在也搜不到什麼衣服，除了夏裝，還是夏裝。我將一件雨衣披在身上，妻子索性把一條裙子套在頭上。這時最艱巨的任務，是把禦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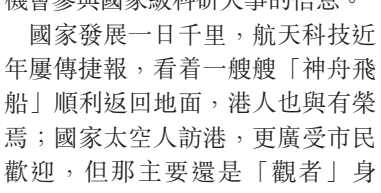
在草地上共走了兩天。第一天傍晚到達松潘縣城。松潘西面，有個地方叫毛兒蓋。1935年7月，毛澤東、周恩來等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這裏。部隊一面籌糧準備過草地，一面耐心等待張國燾率領的四方軍到來。其時，張國燾自恃兵眾槍多，已經不把中央放在眼裏。他野心大發，企圖篡奪領導權。8月6日，黨中央在毛兒蓋的沙窩召開了政治局會議，對張國燾進行批評教育，決定紅軍兵分左右，經草地北上。然而張國燾竟拒不執行中央決議，主張西出阿壩，向青甘邊

退卻。8月20日，中央又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，反對張國燾的錯誤，堅持北上，實現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戰略目標。這兩次會議後，右路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、周恩來等的指揮下，戰勝嚴寒和飢餓，勝利通過草地，到達四川巴西。而左路軍由於張國燾的倒行逆施，使紅軍兩過草地，遭受了巨大損失和痛苦。

第二天，我們開始穿越草原腹地。或許由於氣候逐漸乾燥的緣故，草原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遍地是泥濘沼澤。但天氣依然不好。天空仍不時飄着雪花。遠遠雪峰連綿，眼前野草茫茫。牛糞觸目皆是。顯然，這裏已經成了良好的牧場。而50年前不是這樣。當年紅軍過草地時，也是8月，氣候比現在惡劣得多。記得曾讀過周恩來的警衛員魏國祿的回憶錄：「草地是個氣候變化無常的地區，有時天空無雲，烈日曬得臉上火辣辣地疼；有時烏雲密布，疾風暴雨猛烈襲來，一剎時就像到了嚴寒的冬天。在那愈走愈難走的草地上，長滿了齊腰的水草，起伏不平，踏上去像是走在海綿上的一樣晃蕩。」當時，紅軍後有川軍，前有胡宗南，還要攜帶武器和極少的乾糧，又缺少禦寒的衣服，在茫茫的草地上跋涉了十幾天。糧食吃完了，就挖野菜，吃草根，喝涼水，咽棉花，有許多同志沒有走出草地就累死、餓死了。先烈們沒有想到，在他們倒下14年之後，新中國就誕生了。半個世紀以後，又有一些人坐着旅遊車，來重踏他們的足跡。雖然我們的目的是為了玩耍，但也出於緬懷和感恩。每一個人的心中，都對紅軍懷着深深的崇敬和謝意。

是的，歷史不應該忘記。就在第二天，我們到達了紅原縣。紅原縣屬於阿壩藏族自治州，原先叫哈拉瑪，因為紅軍當年長征經過這裏，解放後更名紅原，意為「紅軍走過的草原」。人民沒有忘記。

出紅原抵南，經刷經寺，直奔成都，離松潘草地漸漸遠了。又是豔陽高照。



琴台客聚

伍宗泉



書聲蘭語

廖書蘭

《黃花崗外》增訂版出書感言

去年(2021年)是辛亥革命成功110周年，北京「團結出版社」出版拙著《黃花崗外》簡體字增訂版，拙書能在內地出版及發行是我多年以來的心願。作為一個居港台灣同胞，自1999年開始在大公報、香港文匯報皆開有專欄；偶寫日月星辰、花鳥蟲魚，偶寫本港社會百態、兩岸情況、國際局勢，20多年來筆耕不斷，樂此不疲寫一個文學人眼中的家國情懷和一顆中國心。

今年10月是辛亥革命成功111周年，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；今年的重陽節(西曆2022年10月4日)是孫中山先生唯一親自策劃、親自領導的史稱第一次「廣州起義」的第127個年頭，這也是《黃花崗外》的主題內容。

每到金秋10月，不期然都會想起中華民族的近現代史。回顧孫先生親自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，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九月初九(西曆1895年10月27日)在廣州發動起義，由於未發一槍即告失敗，歷來無人研究其原因；幸運的，我在胡志偉先生推薦下獲得一份《黨人碑》打字稿，並到香港大學「馮平山圖書館」查閱發表於1907年《時事畫報》(廣州出版)，作者黃世仲以第一次廣州起義為內容的報道文學體小說《黨人碑》，閱讀其中開始滿足我對該次起義竟未發一槍就失敗的好奇；由於當年沒有出版單行本，又《時事畫報》連載的《黨人碑》有三分之一散佚，若欲了解全貌就必須外求，後經中國

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陳鵬仁主任委員的協助，得以翻閱了大量文獻資料，方能全面地了解興中會時期廣州起義的史實，包括背景、成因、失敗、逃亡及失敗後對孫先生本人和清末朝廷與民心的影響。

作者黃世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化人，短暫的41歲生命裏，創作大量的文學作品(共20本)，創辦或參與多份報紙，1903年有「黃世仲的一枝筆，勝過三千支毛瑟槍」之譽；也有「北章南黃」之說，章指章太炎，黃指黃世仲，由此可見，黃世仲在當時有一定的文化影響力。令人扼腕的是，黃世仲(1872年-1912年)並非死於辛亥革命的炮火中，竟是死於辛亥革命成功後，被同志間的猜忌而誣陷陷害。

中華民族自清朝末年的近百年中，受盡外國欺壓，屈辱賠款，內憂外患，民不聊生。今天中華民族的復興，需靠每一名中國人的奮鬥自強，團結一心。而今香港跨過了因香港國安法的設立，被某些人過分解讀，所帶來的誤解而移離香港，及因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全球經濟蕭條。

香港是祖國的窗口，在任何的難關下，都有祖國適時在背後支撐。我們看見李家超行政長官上任以來大聲呼籲，香港要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，要搶人才！是的，不能讓新加坡掏走了我們的人才與錢財，香港已有成熟穩健的金融體制，恢復2019年前的經濟指日可待，「香港好，祖國好」只要有一個中華盛世，才不負辛亥革命的愛國英烈魂。



◆北京團結出版社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出版者《黃花崗外》！作者供圖

